

编者按: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和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敬畏与信仰。无数事实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旦失去文化自信,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民族也就无异于失去精神之钙,失去坚挺的脊梁,迷失正确的前进方向。

文化自信来源历史深处。泱泱大汉、煌煌盛唐,当这些盛世湮灭于历史的长河时,留给人们的是深深扎根在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所以,当人们谈到兵马俑,谈到丝绸之路,甚至谈到不被人熟知的岳,都满怀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就是人们的一种文化自觉。

说到文化自信,不能不说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有了“文化自觉”,才能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有“文化自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只有做到文化自觉,才能在不同文化的对比和互动中稳住根基,获得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继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文化自信不是固步自封,也不是唯我独尊,要在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着眼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倡导和发展先进文化,凝聚奋斗力量。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有文化焦虑。文化焦虑是“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语境中的重要症候,与现代性的文化焦虑具有明显区别的是,这种文化焦虑有一种文化生态背景缺失中的身份飘忽,文化并不能在此寻找到它曾经匡扶过的人的主体,是一种绝望与幻想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精神现象。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进一步审视文化焦虑背后的形成机理、制度关怀、精神区隔、政治训导,有助于厘清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制度、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向中国。以节日为例,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狂欢节等各种洋节在我国日益热闹,而国内的很多传统节日则被冷落。尽管我国各地正不断加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但我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落,城市和乡村里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大地的人文景观随着“旧城改造”和农村模仿城市的时尚建设不断消失。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呼吁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焦虑中有深沉的反思和忧患意识。因为,任何一种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有延续性的,现代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不可能斩断历史来进行。

21世纪,面对全球化发展格局,人类需要重新阐释文明的价值,重新定位本民族文化对世界的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心也在增强。

本期推出“文化自信”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文化自信

- 02 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
- 05 文化自信助中国软实力展示独特魅力
- 09 树立文化自信,要摆脱自负和自卑

政坛经纬

- 11 中央充分认识到了离退休干部的意义

经济纵横

- 12 周其仁: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文化漫步

- 14 唐朝的文化气象

历史深处

- 19 斯大林时期被处极刑人数是沙皇统治30年的1600多倍

悦读时光

- 封三 卡尔·马克思的职业撰稿人生涯(三)

主 办: 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 臧 科

主 编: 刘 进

责 编: 周玉奇

地 址: 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 224005

电 话: 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 75156450@qq.com

网 址: www.yctsg.cn

设计制作: 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文化自信——

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



在建党 95 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文化自信？我们提出“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又为何要践行“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那么，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习近平为何重视“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在 2014 年 2 月 24 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

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的两年间，习近平又对此有过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 年 5 月和 6 月，习近平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要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其语境

更为庄严,观点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传递出这既是文化理念又是指导思想。文化自信于是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

为什么我们在“三个自信”之外还需要“文化自信”?为何习近平如此重视文化的作用?对此习近平早已给出了答案。

因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更因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

“文化自信”只是一句口号、一个理论名词么?不是,我们提倡的“文化自信”有其深厚根基,是可以真正践行的。因为,我们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也有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夯实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根基,奠定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它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诸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扶危济困”的公德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等,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此外,“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民惟邦本”的

治国理念,“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止戈为武”、“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治理思想,“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一直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思想渊源。甚至,我们正努力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小康”这个概念,也是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这些千百年传承的理念,已浸润于每个国人心中,成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构成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我们有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同时又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着再生再造、凝聚升华,从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还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明显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这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一种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文化的积淀、传



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大会。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承与创新、发展,更来自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来自于实现中国梦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兴旺,文化必然兴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华文化正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期。

文化的优秀、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力量,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文化自信的水之源木之本。正如习近平所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的确,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

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国运

中国虽然有强大的文化根基和强劲的文化发展势头,但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文化大国而不是一个文化强国,我们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与物质硬实力的日益强大并不相称。

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践行文化自信,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他还指出:“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至今已开办十年有余的孔子学院,便是我们推行文化走出去的良好实践。据报道,截至2015年12月1日,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10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90万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化之花,已借孔子学院及其他诸多实践之力,开遍世界。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走出国门,让文化自身说话,使其成为不同语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平交流沟通的媒介。在展现中华文化风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呈现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理念,阐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从而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个国家如果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践行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全局,刻不容缓。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文化立世,文化兴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中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影响力的扩展提供更加有效的软保护、构筑更有利的软环境,为我们的强国自信提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

(0160805 新华网记者 赵银平)

文化自信助中国软实力展示独特魅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三个更”使文化自信的内涵更加丰富,表达语境更加充满中国智慧。文化自信铸就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底色更红,文化自信传递中国力量方案智慧的底气更足,文化自信必将注脚实现中国梦的底蕴更深。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三大历史贡献”,正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弘扬,对中国历史的不断总结与创造,对中华民族的责任与担当。当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其先进性所释放的能量巨大,铸就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底色更红。

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尊自爱

回望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顺应历史潮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就,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豁达、兼收并蓄,所特有的广泛性与深厚根基,使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并根植中华大地。

在党领导中国革命早期,当列宁去世以后,共产国际越来越成为遥控各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要求各国共产党绝对服从于、听命于这个中心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政治勇气和魄力,自如运用中国传统哲

学中的整体观,妥善处理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逐渐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活的灵魂的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没有文化支撑的理论是缺乏生命力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蕴含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璀璨夺目。其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旗帜,把握方向,走“中国道路”,无不展示出对中华文化的无比自信,对“中国道路”的无比自信。

文化自信激起民族自省自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深化了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主题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初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正确指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丰富过程而言,无不体现出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担当和文化自信,对发展历史的反思自省和对发展新理论的创立丰富。95年的艰辛历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认识论,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哲学认识论,是对中华历史传统文化、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文化价值的正确

认识和高度自信,其本质就是以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认识、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果的集成,不仅充分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性,也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其“民本思想”“共享理念”“和谐精神”“协调关系”“平衡原则”“辩证思维”等,既是我们党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弘扬推崇,更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文化自信激励民族自警自强

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经在中国大地建立,便焕发出勃勃生机,源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凝聚了精气神,并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与优势,既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又符合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既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阶段性原则的有机统一,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全球化大潮和激烈国际竞争中显示出了自身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需要通过一系列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来体现和实现。

当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并在不断坚持完善制度体系进程中,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是人类社会制度理性化的必然选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最生动写照。

尽管目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的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但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一定会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得到完善,并愈加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自信激发中国力量

2000年,中国还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用“一个

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尽管国内有分析人士指出,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国内媒体应该淡化这一变化,避免国际舆论借机再度炒作‘中国经济威胁论’”。

但曾几何时,中国人“超英赶美”的梦想已不再虚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已举世侧目。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在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基础上的“一带一路”战略,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致力于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开创了地区新型合作的平台,为经济增长、全球化再平衡指明了路径,也为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2016年6月,以“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为主题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的1700多位嘉宾参与中国“十三五规划”:增长新蓝图、新常态中国经济与当代世界、中国智造等热点议题讨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经济“双引擎”等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深度融合,已不断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引领作用已毋庸置疑,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力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世界银行分析今后三年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其中美国经济2018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为15.7%,而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将达到26.4%。

文化自信成就中国方案

2013年9月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结束后,外交部部长王毅说,新形势下,中国正站在更高、更广的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我们将为世界奉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传递

更多的中国信心,同各国一道,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G20峰会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从“怎么看”谈到“怎么办”,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解决方案,并开出加强政策沟通、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四剂药方”。从G20转到APEC,无论是2013年,习近平在巴厘岛APEC会议上提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APEC会议上主张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还是在2015年峰会上,中国方案都继续助力亚太梦想。各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方案让世界继续分享中国红利,随着更多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出和执行,相信中国方案将让世界与中国分享更多经济发展成果。近年来,中国无论在助力国际减贫进程,还是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中所提出的“中国方案”,都展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魅力,彰显出负责的大国形象,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文化自信释放中国智慧

正是这种文化自信,正是这种力量智慧,使中国在世界从单极向多极过渡的过程中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在大国博弈中,还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时,都能自如地运用“中国方式”,破解难题,化危为机。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问题上,一改昔日的“被动防御、韬光养晦”,未雨绸缪,在关键节点提前细密布局,在事关核心利益时敢于亮剑,敢于对非正义、不公正的强权政治说“不”,让始终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国感知“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让世界认知中国的和平崛起,并在外交领域展示中国智慧,昭示大国风范。

近期,针对以美日幕后操作导演、菲律宾登台演出的“南海闹剧”,“中国屏”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登台演播、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声明的郑重发表、“中国南海网”的正式上线,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外

交的胜利,也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自信中所蕴藏的中国智慧。

文化自信绘制梦想蓝图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正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与自信。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展望未来,中国梦已勾勒出民族复兴的梦想蓝图,成为每个中国人梦想的基石。每个人都能从国家前进的步伐中发掘自己的足迹,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拼搏来绘就国富民强的蓝图。这既是对我们党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设立的新起点、提出的新要求,既是中国梦的时代注脚,也是汇聚力量、展示底蕴的魅力所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中国梦强调了个体和集体的统一。当今社会转型期观念波动、利益多元,需要一个共同梦想,来达成共识。中国梦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五彩缤纷的梦想汇聚为一个共同的追求,这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离不开梦想和追求。中国梦,把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融为一体,激发起团结向上的正能量,吹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集结号。

文化自信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回望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艰难历程,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之火生生不息。从新中国成立“中国站起来”,到改革开放“中国富起来”,再到新世纪“中国强起来”,每一

个进程,每一步跨越,都依靠亿万人民凝聚起的磅礴力量。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世界科技发展酝酿新突破的发展格局,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加快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境,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面对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是贯穿实现中国梦的一条主线。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个共享”,点明了凝聚人民力量的基础。凝聚中国力量,需要进一步汇集改革共识。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及到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正是改革再出发的动力所在。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出中国经济社会的升级版。“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团结奋进,需要每个人艰苦努力。中国梦的美丽绽放需要每个中国人行动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填平前进路上的道道沟壑。每个中国人迈出一小步,就是13亿人民前进的一大步。亿万中国人民正扬帆奋进——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正汇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文化自信汇集中国精神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正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创造凝练出的中国精神,这既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魂魄所依。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根本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开个开放中,孕育创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等,为新时期的中国精神注入了时代的脉搏,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进一步活化为民族之魂,升华为我们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展望中国的未来,前途无限,胜利在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靠伟大的精神动力来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95年来一以贯之的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忘党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当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民族脊梁时,将极大增强了党的整体力量,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文化自信既是基础的,又是高层的,既是核心的,又是开放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既贯穿于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之中,又是“三个自信”统一体的根本和最高实现方式。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自信的关键,正因为其底蕴之深厚,才有了中国方式的“举重若轻”,正因为其内敛而蓄势,也才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我们相信中华文化必定会释放出强大精神动力,中国软实力必定向世界展示出独特魅力。

(2016年08月08日人民网 薛志达,宁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文献编辑处)

树立文化自信，要摆脱自负和自卑

■文化自负导致闭目塞听，以至于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从而产生制度性迟钝、制度惰性。文化自卑到一定程度，就会认为“历史文化包袱太沉重”，结果就会走向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功能。历史上，以儒学为核心内容，儒、道、释融于一体的价值体系所构筑起来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是要坚持文化的主体性

■看到发展中存在某些问题，就怀疑现代化道路的可持续性；看到权力腐败现象，就怀疑社会主义的性质；看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现象，就怀疑改革的真正效力。这都是缺乏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表现，归根到底是缺乏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将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并列，扩展成为“四个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从本质上看，道路、理论、制度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则是道路、理论、制度发展的基因。文化自信就是要充分肯定中国自身文化价值，并对中国发展保持坚定信心，使之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显性因素。

对中国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有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的观点，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

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但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我们并不总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曾经有过强烈的自负感，也曾产生过严重的自卑感。

这种文化自负感，是一种对待自身文化态度上的自满自足和妄自尊大的文化优越感。它来源于中国历史上曾经领先于周边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经济成就，也来自于过于封闭、不谙世事的文化守旧主义。最终导致沉浸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以及对外界茫然无知的“文化夜郎主义”。

近代资本主义在法律制度和技术“两个轮子”的推动下，拓展着世界市场，也同时拓展自己的殖民地，把所谓东方落后国家纳入资本的“文明”进程之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鸡蛋从外面打开就是别人的美食，自己从内部打开则是生命。当时的中国对这些进程基本上是毫无所知的。当被西方从外部打开国门后，就不幸成了西方列强的“美食”，任人宰割。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士大夫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文化自负走向文化自卑。所谓文化自卑，就是一种对待自身文化价值的轻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和心理。特别是随着民族危机的一次次加深，一些国人对中国自身文化的失望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形下，文化革新运动在所难免。然而，“新文化运动”在建立新的文化自觉之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做法，如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度要求废除汉字并走拼音文字之路等全盘西化主张。

文化自负导致闭目塞听，以至于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从而产生制度性迟钝、制度惰性。文化自卑到一定程度，就会认为“历史文化包袱太沉重”，结果就会走向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最终导致历史虚无

主义。因此,树立文化自信,既要克服文化自负感,也要克服文化自卑感,即跳出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的窠臼。

关键是树立“三个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今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是要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的自信,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所创造的先进文化的自信。

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进步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揭示的正是中华民族从蒙昧到开智、从封闭到开放、从原始到现代的进程。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是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功能。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绵不绝,正是因为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文化作为精神支柱。历史上,以儒学为核心内容,儒、道、释融于一体的价值体系所构筑起来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文化虽然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但文化又不是简单的附属现象,它内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活动。

树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是要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脉,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也就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今天,西方文化借助于全球化的进程,也借助于现代通信技术,以一种强势文化的身份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形下,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坚持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一旦丧失,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被斩断了,其民族精神和传统也必然会随之丧失。因此,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当今

意义重大。

二是对中国革命文化的自信。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仅中国部分领土被割让出去,而且传统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巨大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各种政治派别都试图寻找中国社会走向的答案。但无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真正找到这个答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推翻了“三座大山”,而且使人民第一次获得了人权上的解放。对中国革命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秘诀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三是对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的当代中国文化的自信。有的人看到发展中存在某些问题,就怀疑现代化道路的可持续性;有的人看到社会上的权力腐败现象,就怀疑社会主义的性质;有的人看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现象,就怀疑改革的真正效力。这都是缺乏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表现,归根到底是缺乏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自信。树立对中国当代文化自信的前提就是要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尤其是客观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正视和应对发展的两面性

文化自信并非仅仅“喊口号”,而要靠社会实践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雄心壮志,要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实践勇气,要有“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豪迈情怀。

实现文化自信,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文化资源既有可能转化为文化软实力,也有可能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包袱。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不忘四大发明。这的确值得引以为傲,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更进一步的技术革命。相反,四大发明传到西方后,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下转第20页)

中央充分认识到了离退休干部的意义

对“老同志下乡”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形成人才资源与乡村建设之间的良性循环。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决策者应该保持敏锐的嗅觉。

一名副部级干部主动申请做驻村书记的事迹，近日受到媒体关注。这位老同志经中组部批准，下沉到村任“第一书记”，一年来尽心做事，带领群众努力脱贫，受到当地群众好评。临近或已退休的高级干部，如何到广袤乡村发光发热，在当下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新课题。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提高，60岁左右或退居“二线”的干部，很多仍然年富力强，且经过多年历练，有较宽的视野、丰富的阅历。“退而难休”的背后，除了较强的成事能力，更有已经看透沉浮、静下心来做点具体事情的意愿。

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人的问题已成为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有能耐的年轻人纷纷进城，导致一些农村“空心化”；有些乡村干部，身在农村，心和家庭却在城里，很难与乡村“同呼吸、共命运”。如果没有人才的“润泽”，将资源导入并结合实际盘活，只是简单把钱和物投到农村，很难发挥可持续的造血功效。

上述两方面的诉求汇流到一起，有理由对此赋予更多期待。实际上，中央充分认识到了离退休干部的意义。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按照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组织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在推进“四个全面”中作出新贡献。在此之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已有不少退休官员主动下乡出力，成为奉献乡里的“新乡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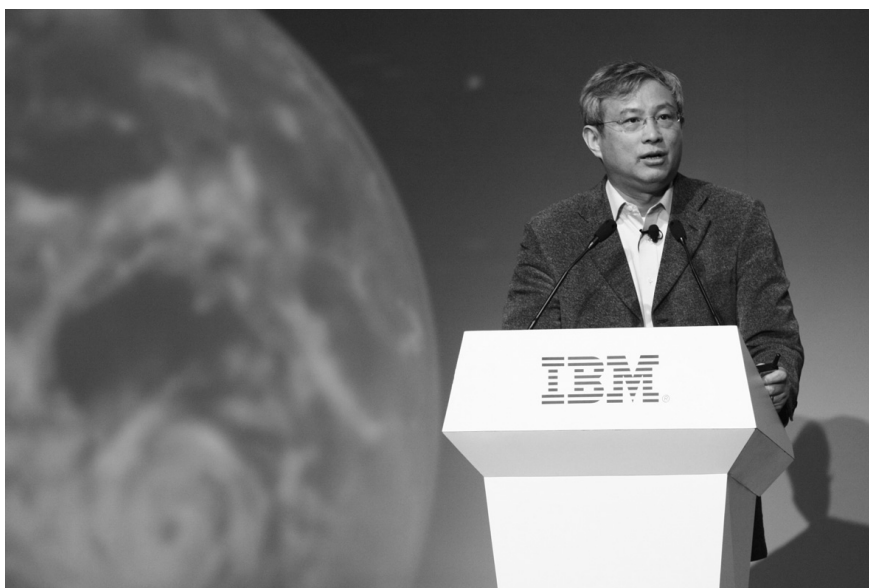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也有老干部在媒体上反映：自己也有到乡村做事出力的愿望和热情，就是不知道人家接受不接受，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怕“开始容易、成事儿难”。由此可见，“老同志下乡”目前虽然还属于自发的特例，但这种热情有普遍意义，应该加强引导，逐步探索工作机制，以组织规范和程序引导。

离退休干部有一定特殊性，中国农村更有着复杂的特殊性，这两方面的对接，并不如纸面上说起来那么容易，既可能两相契合带来积极可喜的变化，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越是这样，越需要从一开始就要严谨、细致，边探索、边总结、边规范、边完善。对于新生事物，我们不能简单盲目地叫好，而应该鼓励尝试、完善机制、因势利导，让更多有能力、有能量、有意愿的离退休干部，到农村大地“释放激情”。如果简单寄托于个别老同志的高境界、高觉悟，而一旦出现失败案例，就又把这种现象一竿子打死，将两方面需求与热情简单扼杀掉，显然也是一种轻率。组织与群众监督机制，不胜任工作的退出机制，与现有治理机构的沟通机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决策者应该保持敏锐的嗅觉。对“老同志下乡”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形成人才资源与乡村建设之间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可以出台更多措施，鼓励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等多种类型的“告老还乡”，推动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也急需加强乡村的文化建设，营造开放格局避免局部封闭，以文化为底色，形成更有效的吸纳社会能量的运行模式，让见贤思齐蔚然成风，努力弥合当下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差距。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努力。

（201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毕诗成）

周其仁： 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们通常会把降成本看作是企业的工作，看作是企业、家庭、个人这些微观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的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就能够增长竞争力，就能够增加利润，也就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

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是不足以显著降下来，应对现在的经济局面。

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中国经济说的再多，中国经济今天在全球立足是靠它的比较成本优势，我们的独到性的东西，创新的东西，未来很有

希望。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在全球立足主要靠比较成本优势，限于我有限的理解、观察，也限于时间，我想举这么几类成本来说明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还不足以完成好这个降成本的这项任务。

第一类法定成本。

你看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有很多开支是竞争当中形成的，如果这个员工你想雇，我也想雇，我们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要素拿到手，这类成本是市场竞争供求决定的。

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比如说你必须交税，比如必须缴社保的缴付。我们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

涨得快,降下来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降下来的。必须我们的立法机关、行政、政策制定方面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够实际工作当中见效的措施。你不降,他就熬不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原材料,这个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的不一定那么快。这样的话,很多企业不等市场成本降到他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他就支撑不了了。应对所谓不要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的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

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你要降低税收,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大,所以你就根据国际经验看,光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降低开支,否则的话,这个窟窿,这个财政的窟窿短期内可以说增加一点赤字,长期看它也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所以这方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要付出的成本。

其实这个经济不管怎么下行,它总还有机会,你看我们的生活,你看我们北京,说经济很慢,但是还有堵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比如儿童医院,我走过几次根本没办法通行,我不是去看病,只是路过而已。发生什么问题呢?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学生不够,是我们潜在的、能做供给的这些医疗服务资源,要对潜在的、巨大的、甚至不是潜在的、明显的需求做反应,中间有障碍。

我们的医改强调了公共服务,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你要知道公共服务,让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你要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这个不是靠喊口号,许愿,表达我们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就够的,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让人们愿意从医,让人们愿意增加医疗服务。

这就要靠价格机制,人生不下来不一定学医,学医不一定到儿科,我们有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付出的成本很

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下行当中,这让我们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很可惜,一方面觉得我们潜在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第三类成本就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

我们看国民经济现象,房地产,虽然全国过量库存,降库存问题很大,可是同时你看深圳、上海、北京房价冲的非常高。什么问题呢?仅仅靠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能适应的,光有购买力,如果没有土地相应的拨过来,没有相应的土地对每个地方的市场作出灵活的反应,它就会出现这个尴尬局面。这里还在讲降低房地产库存,那里房价已经冲天而起,我们又要去调控房价。

关键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严重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的要求,这么一个关键的要素,有行政,有指标,由北京来决定供应多少。我们在深圳做过现场调研,房价涨的同时,有大量土地没有好好用,甚至闲了多少工业厂房,几百万平方米的。问题这些地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呢?这个事情深圳说了不算,只有全国的法规,全国的行政控制决定的,这些成本不降下来,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你得不到,这个反应过程就会非常慢。

这三类法定成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作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我都想把它叫做体制性成本。

中国的经验,过去所以成功,所以能走到世界前列,一个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的大规模的降低了我们的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一个关键所在。

(凤凰国际智库 周其仁: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唐朝的文化气象



刘梦溪先生部分著作

□演讲人：刘梦溪

演讲人简介：

刘梦溪，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现代学人的信仰》、《马一浮与国学》、《红楼梦的儿女真情》等。

编者按：

《旧唐书·魏徵传》中，唐太宗李世民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不仅能知兴替，还能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及在今天可能有的意义。刘梦溪先生长期致力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的解读。本期讲坛邀请著名思想

文化学者刘梦溪先生讲述唐朝的文化气象。

精彩阅读：

■李世民即位后，建立了与往昔很不一样的唐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与制度的改革，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绚丽的文化时代开始了。

■唐朝是诗的国度，诗人之多，创作激情之高，迈越此前的任何时期，包括魏的建安时期、晋的太康时期，以及南北朝的南朝北国，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唐朝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时代。

唐朝的时间历史

讲唐朝的历史时间不得不提隋朝的历史时间。隋朝的建立是在公元581年至公元619年，统一时间是公元589至公元619年。在它统一之前，就是隋文帝当皇帝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隋朝建立的时间应该是38年，不到40年的时间，但是统一的时间是28年。唐朝建立是公元618年，瓦

解是在 907 年，唐朝存在的时间是 289 年，这个时间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了。

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堪称大事。隋朝在统治机构上设立了三省六部，科举取士的制度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些都给唐朝及后世留下了历史的印证。

说也奇怪，科举取士制度具体是从隋朝的哪个年代开始史书上也无记载，只能通过反证。唐初的宰相叫房玄龄，房玄龄早期在隋文帝时也做过大官。房玄龄的生卒年比较清晰，他 18 岁即成为进士，按照这个时间应该是在隋文帝开皇 15 年，也就是公元 595 年，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推断，隋文帝的帝号叫开皇，在开皇 15 年，也即公元 595 年的时候，隋朝的科举制度就已经开始了。隋文帝杨坚在位 23 年，到他晚年的时候，本来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但是听了他太太独孤氏的意见把长子废掉了，立了第二个儿子杨广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隋炀帝小时候无所不为，在独孤氏死了以后，杨坚宠爱陈夫人和蔡夫人，后来杨坚病情加重，杨广到宫里面“侍疾”，竟当着自己父亲的面调戏陈、蔡两位夫人，杨坚非常生气，便决定废掉杨广，还没等废，杨广就把父亲杨坚杀了，自己立为皇帝，这就是隋炀帝。

隋炀帝在位 14 年，用一个通俗的词，就是大大地“折腾”了一番。挖长堑，做洛阳的屏障，耗费民力 200 万人；建显仁宫，祭奠父亲杨坚；修皇家花园西苑，以及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虽然也耗民耗力，却利在千秋百代。隋炀帝还有一个举动就是攻打高句丽，我过去总说，中国历来对外很少用兵，但是隋唐两朝对朝鲜半岛的用兵却很厉害。隋炀帝为了征讨高句丽，而对国内百姓过度残暴征敛，导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并愈演愈烈。公元 617 年，在太原的留守李渊起兵了，从 6 月份起兵到 11 月份就攻占了隋朝的首都长安。

公元 618 年 3 月，唐朝建立，李渊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唐朝建立以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削平群雄”。《隋唐演义》中记载，在征战中功劳

最大的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叫李世民，他个头高、有谋略、骁勇善战，在“削平群雄”中他的功劳最大，后来对秦王李世民的记载非常多。《隋唐演义》中记载，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很早去世，四子李元吉。

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 626 年，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及他们的亲眷，随即登上帝位，他可以说是千古一帝，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皇帝能与之相比。“玄武门之变”后不久，公元 627 年李世民登基，年号贞观，公元 627 年为贞观元年，帝号为太宗。

李世民即位后，建立了与往昔很不一样的唐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与制度的改革，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绚丽的文化时代开始了。

唐朝的诗国气魄

唐朝最引人注目的那自然便是诗歌了！唐诗的发达，前无古人，甚至也可以说后无来者。唐朝是诗的国度，诗人之多，创作激情之高，超越此前的任何时期，包括魏的建安时期、晋的太康时期，以及南北朝的南朝北国，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唐朝的皇帝都能写诗，太宗、玄宗、文宗、宣宗他们都有诗歌流传于后，据说诗写得最好的是唐德宗。唐朝以诗来取士，这也是诗发达的一个原因。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唐朝的文人没有一个不会写诗的，人人都能写诗、会写诗，所以保留下来的《全唐诗》共收了 48900 多首诗，作者就近 2300 人。

在唐诗中，第一把交椅还是杜甫。可以说他是唐朝的第一诗人，他有很大的抱负，自比“稷与契”，以古代的贤人来要求自己。最有名的一句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且关心民众疾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又是非分明：“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尽管他生在开元天宝之时，但却经历“安史之乱”，在公元 755 年的时候，“安史之乱”把这个唐朝的盛世之梦打断了。整个社会的流离、国家的破损，当时的社会状况，跟盛唐时期大不一样。于是，他就有

了这样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出了当时贫富之间的差距。

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的政治经济达到高峰，唐朝的文学、诗歌也达到了高峰。天宝初年时候，一个比杜甫大 11 岁、像神仙一般的、了不起的诗人李白来到了长安。他第一次去拜访贺知章，因为贺知章是宰辅，官阶地位比他们都高，当时很多的初出道的文人学士，经过贺知章的点评，身价立刻提升百倍。贺知章一看到他，就说这是从天上贬下来的仙人呀，“谪仙人”就成了李白的号。李白 25 岁的时候，到四川去，后又离开四川游云梦，这个时候他很幸运，他娶了唐高宗时宰相许圜师的孙女为妻，后来他又娶了刘氏，与刘氏离异后，再娶了一个山东的女人，最后他娶的是宗氏。他骑着骏马带着美妾，游历名胜，所到之处都以礼相待，还有诗为证：“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唐朝社会人们生活富裕，诗人们心情好，作诗的氛围很浓，像白居易的诗：“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好的句子，要写出新的乐府来，要明白天意。李白会弹琴，琴技相当好，诗名很大，琴名也不小，到 61 岁的时候，即公元 761 年，“安史之乱”刚过，他去了金陵，那时候有一个美女，她听完琴声就跟李白走了，李白就教给她唱楚歌、楚地之歌，可是第二年李白就去世了。他写的《示金陵子》就是写给这位投奔他的女子的，“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度西江水。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可以看出李白晚年这种欢悦的心情。当时作诗还有一些方法口诀，杜甫就说：“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就是如果诗要写得正，须读文学，同时对于六经也得了解。

另外，像李白、杜甫他们作诗是家常便饭，杜甫的诗中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就是说作诗是自己家里的事情；杜甫作诗非常用功：“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李杜

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杜的诗是盛唐之诗，也是千古绝唱，甚至在初唐诗作中，即使唐初的“四杰”王杨卢骆，还有人说他们还未脱六朝的旖旎文风，但是他们的诗也很了不起。杜甫对他们的评价也比较公允，杜甫写《戏为六绝句（其二）》：“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说当时这样的写法算是一种开创了，但浅薄的人一直在批评他们。但是，他接着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就是说初唐的诗也能够留下来，更不用说李杜的诗了。

唐诗的厉害之处，在于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时期，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诗人。中晚唐之时，李商隐、李贺也是很杰出的诗人。唐代中晚期时有一项重大的文体变革运动，即古文运动，运动的旗手是韩愈。韩愈的文章气魄大，他特别推崇司马迁，就是“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文章要写得好且思想深厚，一定要学司马迁；如果文章要写得华丽，应该学司马相如。学古文一定要学《史记》，学辞赋不能不学司马相如，所以学骈文、作“四六文”应该从《文选》入手，而写散文的话，要从《史记》入手。我讲这个的目的，是说今天学习文章的写法还是这样，要想文章写得好，一定要读《史记》。

唐德宗、唐宪宗时期，就是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时期，古文运动中提倡的一个重要的文章写法，就是以史来著文，以小说的方法来写文章，所以是一种文体的革新。韩愈的思想很特立独行，在唐朝佛教盛行的时候，他反对佛教。所以，最著名的文章就是《谏迎佛骨表》（《唐宋八大家文钞》为《论佛骨表》），他反对唐朝把佛放到很高的位置。唐宪宗当时看了以后非常不高兴，要杀韩愈，有宰相为他说情才没有杀他，一下子把他贬到蛮夷之地的曹州。韩愈最后写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他很厉害，他说我的《谏迎佛骨表》这个文章是为了除弊，给盛朝除弊，我根本不在乎我的这把老骨头。

唐朝的文化气象

唐朝的风气，它在不同的时期也不一样。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生活进一步稳定，财富积累不断增加，富人不断增加，一般民众的生活也相当不错。唐朝在这个时期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带来了展现的机会，呈现了一种人民富足、社会富裕、国家富强的开元天宝盛唐景象，给我们留下了盛世的美称，留下了诗国的盛名。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国，如果说中国是诗的国度的话，那么唐朝正是诗的一代，唐诗的空前绝后也是世所公认。为什么讲空前绝后？因为唐以前的诗没有像唐朝这么繁荣，而唐朝的那种大规模的、全社会的诗人的气象，在唐之后也不可能有。当然诗还有，但诗人的气象跟唐朝不同了。宋代也有诗，明清也有诗，但是跟唐朝完全不一样，所以要讲诗国的话，唐朝是一个诗国。

杜甫在回忆开元天宝年间盛世的时候，作诗《忆昔二首》，第一首从回忆开始写起，“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这是讲李渊攻打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打得突厥人到处乱躲；“犬戎直来坐御林，百官跣足随天王”，这些打败的四夷的人到朝廷里来了，来了以后皇帝对他们也是有点还不够礼貌呀，大家都光着脚坐到玉床上，但是很轻松。第二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粮仓都满了甚至粮食朽烂了；“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社会安定路不拾遗，九州道路无豺虎，若要远行哪天都可以，都是平安的；“齐纨鲁缟车班班”，写社会的繁荣、忙碌的景象：齐鲁地区好的布料、丝绸在车里面拉着，满满的；“男耕女桑不相失”，男耕女织，一幅安宁的社会景象；“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在朝廷里，奏着这个云门之乐，天下的朋友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如胶似漆一样；“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这时候治礼定乐很便宜。所以盛唐的景象，真是值得宽慰。

魏徵后来写了一首诗叫《述怀》，其中有一句“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土恩”，他的意思是说我并不为艰险而害怕，是因为我太感激唐太宗这个英主把我视作国土，就是国家的大儒，我非常感恩。我喜欢的是他最后一句：“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说社会互相感染的这种气象，是并不在乎功名，我之所以那么尽心尽责地来做事，是由于唐太宗视我为国土，我很感恩，这也是贞观时期的盛世气象。在这样的盛世时期，带来了文学与艺术的空前繁荣。唐朝是汉文化的发扬时期，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充沛的活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儒学方面，特别是对《五经正义》定本的编订。颜师古编订《五经正义》以后，唐太宗叫大家群儒来仔细讨论，就是提出问题请颜师古来回答，大家都感到叹服。《五经正义》的定本，变成当时社会普遍学习五经的版本。所以这个在传统社会、帝制社会，没有不提倡学经学的。经学的一些基本义理我是常讲的，就是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

在佛教方面，唐朝的佛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当然最受关注的事件就是玄奘到印度取经了，而且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玄奘去的时候是公元628年，走遍西域16国，访了很多名僧大德。到了北天竺的摩揭陀国，他向戒贤法师学习经文，又向另一个有名望的大师学习唯识学，所以后来他写了《会宗论》，把不同派别加以汇通。他在印度取得很大成功，印度还专门给他开了婆罗门大会，召集天竺所有的沙门等一起开这个会，且在曲女城，大家都来听玄奘讲“两论”，讲了8天，大家都很入神，玄奘取得了无上的荣誉。他归来的时候带了657部梵文佛书，唐太宗命他专心翻译，直到公元664年玄奘死去。所以讲唐朝的佛学以及中西交流方面的成绩，玄奘是了不起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当然在佛教方面还有以慧能为首的中国禅宗的南派南宗，一旦禅宗南宗出来，佛教的汉化、中国化就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在思想文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提倡三教合一、三教汇通，特别是到唐德宗的时候，儒佛道三教一起来讲论。在这个时候儒和佛有

调和，佛的方面也逐渐和儒合流，僧徒做儒业的、从事儒学的人也很多。中晚唐的诗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等这样的名号，儒佛已经融为一体了。

说到唐朝的文风，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的文风比较讲究辞藻绮丽、文风细腻，但是有艳气，即花艳之气，甚至还有点妖艳之气。然而，到了唐朝，从初唐“四杰”，到盛唐“李杜”，文风有很大的改变。初唐时期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感叹，对以往文风的批评和不满，以及对后来者的展望。因为在隋统一以后，南朝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虽然这种文风为很多有识之士所不取，但却被社会接纳、被人们喜欢。因此，虽然有一些文人要求实录、直抒，但是南朝的文风，还是很大地影响了北方。由于这个影响大，流行很广，所以不断有人提出要改变。

唐朝流行的文体是“四六文”，又称骈文，是一种讲究对偶、平仄对偶的文体。一直到宋朝，也还是大兴“四六文”，在唐朝更如是。如果不懂“四六文”，做官都不易，因为所起草的一切文件，都是用“四六文”写作的。作“四六文”，要用很多古语典故，还要做成对子，举对切事。这种声律对偶化的文风，在唐朝很流行，所以做这些文章的人，通常要读大量的书籍。韩愈的诗中还说“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这是对称；“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得好好念书才能记住很多。顺应这种社会要求，有很多类书出版，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现在依然还在出版，当时写文章作诗必须会用典故，这类书会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唐朝的人文学术成就很多，史书也很多，特别是杜佑的《通典》、刘知几的《史通》，都是这一时期的。这两部书到现在还是史书的经典之作，也是工具书中被广泛接受的。科学方面有李振峰用铜制作的浑天仪，而唐朝的历法革新的步骤非常快，有很多著名的历法产生于唐朝，像《戊寅历》、《麟德

历》、《大衍历》，特别是《大衍历》。医学方面，孙思邈的《千金方》就出现在此时。

唐朝在艺术方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书法也达到了高峰。王羲之的书法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为唐太宗喜爱王羲之。《晋书》的《王羲之传》的传论是唐太宗写的，他非常喜欢《兰亭序》，说“王书”，王羲之的书，尽善尽美、古今第一。

唐初的大书法家，当然是欧阳询和虞世南，后来就是褚遂良和薛稷，薛稷是褚遂良的外孙。大家多会关注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因为他们留下的作品较多。薛稷也很了不起，当时唐朝有一种说法是“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说如果褚遂良的书法作品没有买到，买到薛稷的也一样好，可见薛稷的地位也很高。盛唐时期的大书法家，就是颜真卿了。颜真卿一出来，创造了唐朝的一种新书体。王羲之的字还带有六朝的风气在，笔韵圆熟好看，一等书法，但到了颜真卿，颜书恰好把盛唐的风气带了进去，那才叫一个绝呀。

在画的方面，初唐时期的人物画首推阎立本、阎立德兄弟两人，盛唐期间的人物画代表非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了，中唐时期的人物画家韩滉的《宣和画谱》中包含36件韩滉作品，一定也不会陌生。唐朝的山水画分为南北两宗，北宗是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南宗则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特别是王维，诗、书、画，王维“三绝”。

唐朝的音乐舞蹈也空前繁荣。隋文帝的时候有《七部乐》，到隋炀帝的时候改成《九部乐》，唐高祖的时候也是九部。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则定为《十部乐》，这时候《十部乐》里面已经有胡乐参入进来了，这一时期最能代表音乐成就的，要属《霓裳羽衣曲》了。当时从西域传来音乐，同时舞蹈也传来，舞蹈跟音乐是互相配合的。西域传来的舞蹈中，胡旋舞和《兰陵王》，一直负有盛名。唐朝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时代。

(人民政协报 01607025)

斯大林时期被处极刑人数 是沙皇统治 30 年的 1600 多倍

核心提示：索翁写道：“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 1905 年到 1908 年共处死将近 2200 人（一个月 45 人！）。”与前者相比，1930 至 1953 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被处极刑的人数是沙皇 30 年的 1600 多倍；与后者相比，斯大林每个月处决的人数是帝俄最残忍的年代的 60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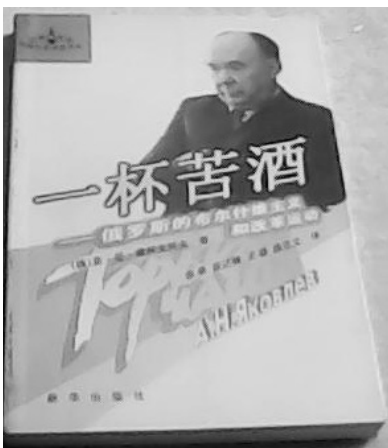
斯大林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袁晞，原题为：有多少人非正常地死在斯大林时代？

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斯大林是暴君，他几十年的统治是暴政时，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还被蒙在鼓里，仍把他称为“伟大的革命导师”。1963 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发表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著名的“九评”，其中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是这样说的：“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当时和以后很多年是相信这一评价的。由于“二评”是针对赫鲁晓夫的，当然也要就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谈点看法，但“二评”基本上是为斯大林评功摆好，勉强地提到“错误”，也是为其辩解：“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可能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不知历史的真相，因此也只能相信《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所说的，有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才渐渐知道了真相，1983 年第一次读到索尔仁尼琴大作《古拉格群岛》的中译本时，被斯大林时代巨大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所震撼。同时也相信索尔仁尼琴所说的苏联官方绝不会公布非正常死亡的准确数字。索尔仁尼琴多年前是这样写的：“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谁想到 1991 年苏联解体，顷刻之间呼喇喇似大厦倾，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在一个国家的彻底崩溃，让世人有了知道这个政权历史真相的可能。



1999年亚·尼·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他还写道：“1954年，内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他本人曾是镇压的积极参与者、强制迁徙北高加索民族的组织者)报呈赫鲁晓夫：1930年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由于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特别顾问，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时期都担任“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所以他提供的数字是可靠的，不算官方

也至少是半官方。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历史档案解密公开，铁幕后面的场景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这些档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关注这些历史的人，2002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执行总主编沈志华)共34卷在中国出版，其中《关于苏联大清洗》和《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等专题，都提到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特别是第30卷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88年12月25日)》中有了正式的被镇压者的官方数字。报告中写道：“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

(2016年7月27日人民网 袁 晞)

(上接第10页)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实现文化自信，就要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既要善于吸纳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有勇气抛弃文化糟粕。

实现文化自信，要正确认识中国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发展迅速，尤其是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令国人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进程中还有不少问题，过去留下来的问题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新的发展中也会产生各种新问题。面对这种两面性，我们要用中国话语讲中国好故事，也就是讲中国现代化成功的故事；同时，要用适当的方式讲清楚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艰巨性。这样才是客观的中国故事，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实现文化自信，要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特别是

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中国文化发展至今而不衰，就是因为不断在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融合中，实现自我革新。在此过程中，要避免走极端，不应“言必称希腊”，也不要把西方的一切视为洪水猛兽。

实现文化自信，要勇于创新 and 善于创新。文化创新的基础是传统文化，所以要有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同时，文化的发展创新是在多样文化的交融与竞争中实现的。文化的生命力和创新力还在于传播力和影响力，既要表现出大胆的吸纳，也要表现为积极地对外分享。这是文化创新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也是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2016-08-02 解放日报 作者胡键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软实力研究”首席专家)